

梁启超的日本观

焦润明

梁启超是对日本问题讲得最多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日本观形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流行“师日”风潮之时,反映着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基本看法,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另外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梁启超那里,日本事情不过是为其社会改革思想提供思想素材、经验教训和比较、借鉴参照坐标的“东方特例”而已,他的终极关怀并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即他的日本研究是为中国的腾飞提供战略思想这一目的服务的,这应该说是梁启超日本观的一大特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研究梁启超的日本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对 100 余年前中国知识分子日本观的了解,而且对我们深入探讨梁启超的社会改革思想也非常有意义。

(一)

在梁启超眼里,日本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新兴国家,“日本者,世界后起之秀,而东方先进之雄也。”^①“夫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②“日本以区区三岛,县琉球,割台湾,胁高丽,逼上国,而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屏息重足,莫敢藐视。呜呼,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下简称《文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26 页。

② 《日本国志后序》,《文集》之二,第 50 页。

真豪杰之国哉!”^①这些评价反映了梁启超对日本的基本看法。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避难日本。踏上日本国土,使之得以亲眼目睹日本的进步,他在日本所著《新民说·论进步》一节中曾这样感慨地写道:“吾昔读黄公度《日本国志》,好之,以为据此可以尽知东瀛新国之情状矣。”^②甚至他对日本公使矢野龙溪提出的靠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了解日本“是无疑据明史以言今日中国之时局也”^③,因为日本自维新以来“每十年间之进步,虽前此百年不如也”的见解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可是,在日本“证以所见,良信。”^④承认矢野的说法不假。从而,由日本进步又引发了他对中国发展迟缓、落后的感叹,“斯密亚丹《原富》,称元代时有意大利玛可波罗游支那,归而著书,述其国情,以较今人游记,殆无少异。吾以为岂惟玛氏之作,即史记汉书二千年旧籍,其所记载,与今日相去能几何哉?夫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族之民,而何以一进一不进,霄壤若此?”^⑤通过与日本对比,梁启超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缓慢、落后的发人深省的问题。那么,日本何以能取得如此迅速的进步,它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梁启超在著述中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了他的看法。

第一,梁氏认为改革是日本迅速崛起的关键。他在文章中曾多处提到改革与日本崛起的关系问题:“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⑥“日本败于三国,受迫通商,反成维新之功。”^⑦“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⑧显然,

① 《记东侠》,《文集》之二,第30页

②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以下简称《专集》),第5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变法通议》,《文集》之一,第3页。

⑦ 同上,第6页。

⑧ 同上,第7页。

梁启超是把日本的崛起归因于维新改革事业的。那么,日本改革成功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梁启超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认为日本改革一开始就“先务其本”,从改革官制和吸收西方近代科学入手。他说:“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①,这与中国人“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是根本不同的,“强弱之原其在此乎?”^② 梁氏用对比、反问的方式提出了中日改革一兴一衰的根源。他还指出:日本改革成功的另一原因是“借他人所阅历有得者,而因而用之”,同时学习西方却又不限于西方,“日本法规之书,致纤致悉,皆因西人之成法而损益焉也”,并不简单地照搬西方,而是参照西方的典章制度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加以取舍。这正是日本改革的成功经验。梁启超指出“日本变法,则先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而效乃大异也。”^③ 这一点是对洋务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

第二,梁启超认为,日本的成功还在于有一批敢于忘我献身,杀身成仁的志士。“日本自劫盟事起,一二侠者,激于国耻,倡大义以号召天下,机捩一动,万弩齐鸣,转圜之间,遂有今日。”^④ 为此他特著《记东侠》一文,赞颂日本侠义爱国之士,并且还在其他文章中直接间接地谈到了日本志士的作用。其中讲得最多的就是吉田松荫。他不仅认为吉田为“日本维新之首功”,“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而且还认为“举国志士,风起水涌,卒倾幕府,成维新,长门藩士最有力焉,皆松荫之门人也。”^⑤ 由此可见,梁氏对吉田在明治维新史中的地位之评价是相当高的。吉田松荫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志士,1859年死于“安政大狱”,时年仅29岁,并没能直接参与明治维新变革。对此,梁氏不是不知道,他也曾

① 《变法通议》,《文集》之一,第68页。

② 同上,第8页。

③ 同上,第69页。

④ 《记东侠》,《文集》之二,第31页。

⑤ 《自由书》,《专集》之二,第2页。

讲过：“考松荫生平欲办之事，无一成者。初欲投西舰逃海外求学而不成；既欲纠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既欲遣同志阻长藩东上而不成，事事为当道所抑压，卒坐吏议就戮。时年不过三十，其败也可谓至矣。”但梁氏之所以钦佩松荫，关键在于梁氏看重了松荫的首创开拓精神，正如他所说：“吾所谓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正谓是也。”^① 难怪他又说：“读松荫之集，然后知日本有今日之维新者，盖非偶然矣。”^② 梁启超认为日本改革的成功，正是有吉田松荫这样一批敢于“自取其败”，为天下立命的勇士。

第三，梁启超认为日本的成功还在于有一批敢于开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日本之有今日，盖学者之功最高。”^③ 正是有了他们，日本才在思想文化上迅速冲破了封建锁国牢笼的禁锢，开始了走向新世界的历程。例如，梁氏在其《变法通议·论译书》中，就讲到了日本先驱者在传播西方文化中的作用。他说：“日本自彬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泊尼虚曼子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④

在众多日本先驱思想家中，梁启超最推崇福泽谕吉和加藤弘之二人。福泽和加藤都是明治初年启蒙团体“明六社”的主要成员。福泽有“日本伏尔泰”之称，他一生著译约六十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为《西洋事情》、《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等书。他还创办了庆应义塾，培养出了一大批学生，特别他在改造日本国民的思想观念和从事新式教育方面，对日本近现代社会影响颇大。对其生平，梁启超十分熟悉，他曾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写道：“福泽谕吉当明治维新以前，无所师授，自学英文，尝手抄华英字典一过。又以独力创一学校，名曰‘庆应义塾’，创一报馆，名曰‘时事新报’，

① 《自由书》，《专集》之二，第3页。

② 同上，第92页。

③ 同上。

④ 《变法通议》，《文集》之一，第67页。

至今为日本私立学校、报馆之巨擘焉。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① 显然梁启超把福泽视为对明治维新贡献最大的人物。福泽这样一位“穷乡布衣”在野学者竟能对日本的思想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难怪梁氏发出了“耗矣哀哉！吾中国至今无一福泽谕吉其人”的感叹了。

加藤弘之是梁启超推崇的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加藤曾著《真政大意》、《国体新论》等书，宣传“天赋人权”思想。其后又著《强者的权利竞争》和《道德法律的进步》等书，又系统地阐述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为日本的德国国家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与信奉者。对于加藤，梁启超是这样评价的：“日本文学博士加藤弘之，德国学派之泰斗也。专主进化论，以爱己心为道德、法律之标准。其言固多偏激有流弊，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其影响及于日本学界者甚大焉。”^② 并承认“余夙爱读其书”^③，显然，梁启超也是把加藤弘之作为对日本明治时期思想界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来看待的。此外，梁氏对明治时代其他的文学家也有评语，如他对德富苏峰评价道：“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④ 总之，这些思想家为日本的改革作出了劈莽开路的先锋作用。

第四，梁启超认为日本之兴在于日本民族有一种“剽疾轻死”的尚武精神。

梁启超说：“日本距今三十年前，为封建之国者殆八百年。故有一种所谓武士道者，日人称之为太和魂，即尚武之精神是也。”^⑤ 他

①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文集》之六，第115页。

② 《自由书》，《专集》之二，第92页。

③ 同上，第69页。

④ 《汗漫录》，《专集》之二十二，第191页。

⑤ 《文集》之十，第57页。

又说：“日本之兴，侠客与有功焉。所谓武士道，所谓大和魂，皆拔剑击柱一瞑不视之徒也。井伊直弼死于是，大久保利通死于是，森有礼死于是，今星亨复死于是。虽曰害社会之秩序，而旱地霹雳，往往使天地为之昭苏者，日本之精神，其在是欤。”^① 旅居日本，更使梁启超对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及其行为有了亲身感受，“冬腊之间，日本兵营士卒，休憩瓜代之时，余偶信步游上野，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有题曰欢迎某师团步兵某君，某队骑兵某君者。……盖兵卒入营出营之时，亲友宗族相与迎送之以为光宠也。……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过是也。……余于就中见二三标，乃送入营，题曰‘祈战死’三字，余见之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② 由此联想到，“吾尝见甲午末间，日本报章所载赠人从军诗，皆祝其勿生还者也”^③ 的经历。梁氏在《新民说·论尚武》一文中又说：日本“今者入队之旗，祈其战死，从军之什，祝勿生还。好武雄风，举国一致。”^④ 他强调，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威定霸”、“立国维新”、“雄立于东洋之上”，就是根基于日本民族“尚武”^⑤ 精神。日本“尚武”与中国“右文”产生的鲜明反差，引发了梁启超更深层的危机意识，“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⑥ 梁启超由衷感慨，发出了“中国魂安在乎”的呐喊！当然，梁氏的这番议论过于绝对化了，但这种深层的危机意识，恰恰是他的可取之处。

(二)

把日本作为学习西方成功的榜样看待，这是梁启超日本观的

① 《自由书》，《专集》之二，第 37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38 页。

④ 《新民说》，《专集》之四，第 109 页。

⑤ 同上。

⑥ 《自由书》，《专集》之二，第 98 页

最主要内容,而这种看法无论在 1896 年他写的《变法通议》一文,还是踏上日本国土后于 1902 年始写的《新民说》等论著中,都是一致的。1896 年他即认为,日本“尽取西人之学而学之,遂有今日也。”^① 1897 年他又写道:“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②。旅居日本以后,梁启超更有“读日本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③ 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更增强了向日本学习的信念。

第一,他主张学习日本民族“锐于进取,而勇于舍短”的精神。近代日本的成功无疑也受益于日本民族历史继承下来的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在近代以前一直师法中国,近代以后又转而向西方学习。然而其内在的学习机制并没有改变。所以他说:“日本人最长于模仿性”^④。“迨明治十年前,则国人之慕西风,若群蚁之趋膻也。此其最切近而彰明较著者也。”^⑤ 可知,梁启超对日本民族这一文化传统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曾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如日本,未尝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诸我国取诸欧西者。”但是,只要能把别国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进行适合本国需要的改造,那么“此学即为其人所自有”,“一人如是,一国亦然。”只要能学得来,学得好,“食而化之”,变成自己的东西,才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他又强调思想文化“惟当以其学之可以代表当时一国之思想者为断,而不必以其学之是否本出于我为断。”^⑥ 日本民族正是在学习别人长处的基础上使自己的国家获得进步发展的。日本人“常以不若人为耻。人之有善,则急起直追之若不及。而凡有所

① 《变法通议》,《文集》之一,第 64 页。

②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文集》之二,第 52 页。

③ 《论学日本文之益》,《文集》之四,第 80 页。

④ 《说国风上》,《文集》之二十五(下),第 5 页。

⑤ 《说国风中》,《文集》之二十五(下),第 6 页。

⑥ 《文集》之七,第 63 页。

效，必实事求是，以得其真似。”^①梁氏认为：这种精神，应当成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他说，“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②

第二，学习日本重视教育的精神。梁启超特别指出日本之所以能“不下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③，主要靠的是教育。“欲求新政，必兴学校，或谓知本矣”^④。而重视教育直接表现在巨额教育经费的投入上，“日本区区三岛，而每年所费，亦至八九百万，人之谋国者，岂其不思撙节之义，而甘掷黄金于虚牝乎？”^⑤日本是把重视教育作为强国的根本看待的，而且得到了回报。“彼日人二十年兴学之费，取偿于吾之一战而有余矣。”与此相对，中国得到了报复，“使吾向者举其所谓二万万而百分之，取其一二以兴群学，则二十年间，人才大成。去年之役，宁有是乎？”^⑥显然，梁启超通过中日比较，把教育费用投入不足造成的局限看成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原因。

日本重视教育还表现在“借才异地”，利用外国的智力资源上。“吾闻之，日本变法之始，客卿之多，过于中国也。”但是，日本聘用西人只属于应急性的权宜之计，并没有放弃自主原则，“至今一切省署，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他主张这方面也应向日本学习。

第三，学习日本人的务本求实精神。日本非常重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学”。“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⑦于是，尽采之以培养社会急需人才。

① 《说国风上》，《文集》之二十五（下），第5页。

② 《变法通议》，《文集》之一，第30页。

③ 同上，第36页。

④ 同上，第9页。

⑤ 同上，第20页。

⑥ 同上，第10页。

⑦ 《论学日本之益》，《文集》之四，第80页。

“以故数年之间，人才大成，各用所长，分任庶政，是以强也。”^① 梁启超认定“务本求实”也是日本迅速强盛的重要原因，他主张学习日本重视实学的精神。例如，他就曾强调学习日本商学商法的重要性。“日本商学商法之书，不可不研究也。”因为它是“经商之甲冑”，“经商之圭臬”，^② 是与“欧人竞争自立”的“急务”，对发展近代中国的经济，拓展海外市场非常重要。

日本重视实学讲求实效不仅表现在学习西方一切有用的东西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把人才作为建设新国家的栋梁来培养的育才宗旨方面，这与清朝设“同文方言之馆”仅仅为了培养一些“翻译通事”等工具型人才截然不同。此外，由于日本社会具有“用其所学，学其所用”的机制，不必专恃当官一途，所以，造就了“几于无人不学”^③ 的局面，“以故缝掖之间无弃才，而国家收养士之效”^④。这点与中国“为官而学”，科举一废，“举国几无复向学之人”^⑤ 是完全不同的。总之，务本求实也是日本成功的一条经验。

第四，学习日本民族“发愤为雄”的精神。梁启超说：“使欲造就君国一体同仇敌忾之国民也，则宜法日本。”^⑥ 他认为日本民族有一种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民气，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前后过程最能说明这一点。“琉球事件交涉中，我北洋舰队游弋长崎，为示威运动。我水兵与彼警察哄，其交涉之结果乃至勒使长崎警察不得带刀，日本耻之，乃自下令全国警察不带刀以解嘲。彼岂其乐受也，而忍之若干年”。^⑦ 甲午战后，以俄国为首，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不过以其所夺人者归原主耳”，^⑧ 却引起日本举国“莫不瞋目

① 《复刘古愚山长书》，《文集》之三，第13页。

② 《论商业会议所之益》，《文集》之四，第19页。

③ 《岁晚读书录》，《专集》之二，第115页。

④ 《复刘古愚山长书》，《专集》之三，第13页。

⑤ 《岁晚读书录》，《专集》之二，第115页。

⑥ 《论教育当定宗旨》，《文集》之三，第59页。

⑦ 《新民说》，《专集》之四，第144页。

⑧ 同上，第145页。

切齿，攘臂扼腕”，^①而“彼忍之之时”，正是其“卧薪尝胆”汲汲焉于种种方面预备实力之时。^②日本为了打败老大中国，自料国小民寡不敌，“于是倡为强种之说，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故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遒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镝若甘饴，国之勃然，盖有由也。”^③日本早有亡我之心，正是这种侵略意识调动了该民族的潜在力量。为了打败俄国，日本全民族全力支持战争，特别在日俄战争之际，日本国内上至贵族下至一般百姓无不节衣缩食，举其所有，以充军费。那么日本人为何这样狂热地支持战争呢？梁氏转引了一段日本人的自白：“今兹之役，我日本存亡所由系也，苟军费不继，以至于败，则吾侪性命财产更复何存？故不惜罄所有而献之也”。^④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发愤为雄的精神，日本才取得了两战的胜利，“甲午一役，而二十年来对于中国之耻辱，乃尽雪也。”“甲辰一役，而三十年来对于俄国之耻辱，乃尽雪也。”^⑤日本打败中国和俄国是其长期扩军备战的结果，更是全民族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民气的体现。对此梁启超感慨地写道：“今日群盗入室，白刃环门，我不一易其文弱之旧习，奋其勇力，以固其国防，则立羸羊于群虎之间，更何术以免其吞噬也！”^⑥他从日本的经验出发，提出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总之，梁启超是把日本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取得成功的榜样看待的，因此，他特别强调学习日本的重要性。因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⑦日本经过三十几年时间，已经基本消化了西方文化，借道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此，梁氏还作一形象的比喻：“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家夫，而

① 《新民说》，《专集》之四，第34页。

② 同上，第145页。

③ 《医学善会叙》，《文集》之二，第69页。

④ 《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文集》之二十五（下），第42页。

⑤ 《新民说》，《专集》之四，第145页。

⑥ 《新民说》，《专集》之四，第118页。

⑦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文集》之二，第52页。

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① 梁氏虽然也认识到“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但他仍然认为中国人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有学习的必要，正所谓“久饫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果腹矣，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② 对于急需吸收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借道日本学习西方，乃为不得已之事，亦不失为经济便捷的途径。梁启超强调：只要“尽译其书，译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内，以数年之期，数万之金，而泰西数百年数万万人新得之学举在是。”用最短的时间、用比较少的人力和财力迅速成功地移植西方新学，就可以使中国达到“言矿学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农工商无不新；言化光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③ 的地步。由此可见，梁启超学习日本“西学”的动机还是服务于希望祖国早日强盛这一目的的。

(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而构成其启蒙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日本观，主要形成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这点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识在甲午战争前后发生的变化有着内在联系。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虽然在西方列强面前屡现劣势，但在亚洲依然抱有优越的心理，对日本亦是如此，绝大多数人仍把日本作为不足挂齿的“蕞尔小国”看待。虽然也有人预见到日本的崛起将对中国构成威胁，然而这蛙鸣中的蚂蚁之声丝毫没有影响总体上对日本的优越态度，甚至在甲午战争将要发生之前，还有人声言日本与中国开战不过是“螳臂当车”，中国迎战将是“全狮搏

①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文集》之二，第 53 页。

② 《论学日本文之益》，《文集》之四，第 81 页。

③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文集》之二，第 53 页。

兔”^①。由此可见一般国民对日的心态。可是，甲午一役，日本这个东方的蕞尔小国却出奇制胜地打败了昔日被奉为上国的老大中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震惊，这种震惊不亚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引起的“变局”认识。例如，梁启超提到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时曾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② 甲午战争导致了国人的全面反思，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日本认识，更引发了全面“师敌”热潮。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撰文介绍日本的成功，而且还走出国门，到日本留学，向这个“蕞尔小国”学习。总之，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识以甲午战争为界，前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的梁启超的日本观，其内涵也更多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日本观的主要特点。1896年梁启超撰写的《变法通议》一文，可以看成是其日本观形成的标志。该文系统地提出了变法思路，强调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日本为“自变者”，属于东方后进国家主动改革而成功的榜样，对中国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借鉴性，因此，梁启超从变法，吸收外来文化，重视教育等方面介绍了日本的成功经验，提出向日本学习的课题。1897年他又著《论东侠》、《日本国志后序》、《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南学会叙》、《论中国之将强》、《医学善会叙》、《复刘古愚山长书》等文，展开了他的日本观。从1898年底梁启超踏上日本国土起到1904年左右止，是梁启超日本观确立的时期。他承认日本明治文化给他以很大影响，“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③ 对日本的认识也更加深刻。而1899年写成的《自由书》和1902年至1906年陆续写成的《新民说》等著作，则是梁启超日本观确立的标志。

梁启超的日本观基本上属于“师敌型”的。“近师日本，以考其

① 曾朴：《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1页。

② 《戊戌政变记》，《专集》之一，第1页。

③ 《夏威夷游记》，《专集》之二十二，第186页。

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古之实学，保天府之腴壤，其诸务本之君子，或有乐于是欤？”^① 这段文字便反映了“师日”的心理，反映了梁启超日本观的基本取向，即反映了梁启超通过总结日本成功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改革事业服务的基本宗旨。

对于近代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梁启超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日本虽为“世界后起之秀”，但也不过为世界二等国而已，因为“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② 更何况：“其文明程度，殊属幼稚，远下于欧洲数等”^③。因此，主张向日本学习的梁启超也不过是把它作为一个学习西方成功的范例看待，并想从中获得某些改革启示而已。为此，他对当时“事无大细，动辄曰日本”盲目崇拜日本的风气提出了批评，指出日本有可学者，亦有不可学者，“日本非吾之所宜学也。彼岛国，吾大陆，一也；彼数千年一姓相承，我数千年禅篡征夺，二也；彼久为封建，民习强悍，我久成一统，民溺懦柔，三也。”^④ 用以上三点概括中日两国历史文化的差异，其对错姑且不论，然而他强调向外国学习应考虑彼此间国情再加取舍的见解却是非常可取的。正是这一见解在梁氏那里衍生出许多的事例。例如：他认为加藤弘之的理论“最不宜行于今日之中国”，但同时他又表示“择而从焉，淘而弃焉，岂不在我？”^⑤ 本着这一原则，他重新解释了加藤的“唯心的变型爱己心”理论，强调把自私的爱己心扩大为爱家、爱国心，就可以赋予全民族以强大的爱国主义动力，从而为我所用。

再如，梁启超非常推崇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认为这与日本天皇一姓相承的历史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它的国家思想发达。但

① 《农会报序》，《文集》之一，第 131 页。

② 《东籍月旦》，《文集》之四，第 82 页。

③ 《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文集》之十一，第 53 页。

④ 《论教育当定宗旨》，《文集》之十，第 60 页。

⑤ 《自由书》，《专集》之二，第 98 页。

就尚武之风的实质而言,却是“由人民之爱国心与自爱心,两者和合而成也。”^① 只要使国家成为人民的国家,每个人都有为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而牺牲的要求,那么尚武之风就会随之而成。这些都说明梁氏具有根据本国的现实需要而借鉴别国经验的思想风范。

梁启超推崇近代日本改革的成绩,主张向日本学习,但是同时也给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以无情的批判。他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时说,日本人学习西方人污蔑中国“华种之野悍、华民之愚诈、华教之虚伪”的“故智”,“于其报章日言台湾之民顽恶刁狡,不如生番之驯善”^② 的这种卑劣作法,不过是为其“屠戮淫掠”制造借口而已。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梁启超也撰文表达自己的愤慨。他说“吾劝日本人切勿误认题目,以第二之朝鲜视我中国。……殊不知我国绝非朝鲜比也。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中。……凡以正义待我,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③ 他正告日本当道者,灭亡中国只能是痴心妄想,终必遭致中华民族的抵抗。这些充满着爱国主义思想的言行,也正是梁启超思想中的闪光之处。

总之,“师敌”是梁启超日本观的核心内容,服务于他的变法主张。他的日本观体现着一种以“不若人为耻”的心态去审视日本巨变并从中吸取教益的民族自强精神,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认识的主流。

(责任编辑:王也杨)

(作者焦润明,1958年生,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① 《自由书》,《专集》之二,第38页。

② 《论中国之将强》,《文集》之二,第11页。

③ 《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文集》之三十二,第95页。